

杨任之 编著

诗经探源



河之洲

关关雎鸠

君子好逑



青 岛 出 版 社

诗经探源

杨任之
编著



青 岛 出 版 社

鲁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经探源/杨任之编著. —青岛:青岛出版社, 2001. 7

ISBN 7-5436-2328-5

I. 诗… I. 杨… II. ①诗经-注释 ②诗经-文学研究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2436 号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诗经探源 |
| 编 著 者 | 杨任之 |
| 出版发行 | 青岛出版社 |
| 社 址 |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(266071) |
| 邮购电话 | (0532)5814750 5814611—8862 |
| 责任编辑 | 李新堂 郭东明 |
| 装帧设计 | 刘 媛 |
| 照 排 |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公司 |
| 印 刷 | 胶南市印刷厂 |
| 出版日期 | 2001 年 7 月第 1 版,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开 本 | 32 开(850×1168 毫米) |
| 印 张 | 22.75 |
| 插 页 | 2 |
| 字 数 | 560 千字 |
| 印 数 | 1—3000 |
| ISBN | 7-5436-2328-5/I · 364 |
| 定 价 | 29.80 元 |

序

褚斌杰

中国诗歌有着久远的传统。早在以公元前6世纪左右,就出现了一部经当时乐官之手采集编辑起来的诗集——《诗三百》篇,也就是被后世儒家学考所尊称的《诗经》。

《诗经》作品主要产生于当时的北方中原地区,是根植于我国黄河流域古老文化土址中的艺术花朵,它以贴近现实、淳朴自然为特征,受到人们的喜爱,成为我国文学园林中的最早硕果。

《诗经》是一部诗歌总集,从创作年代说,它包括了上下五六百年之间的作品;从作者说,它包括了当时社会上不同身份、不同社会经历,以及不同性别、性格作者的创作;从体裁上它包括了抒情、叙事、讽喻、颂赞等各种文学样式;而题材内容更是多种多样,有的写农事、狩猎、行役、战争、宴饮、祭祀、歌舞,有的写爱情、婚姻、民俗,而且形象极为生动,美妙动人。它就像当时社会的一部形象化历史,一个精金美玉杂收并储的宝库,丰富多彩,眩人耳目。

但是这样一部异彩纷呈的诗歌作品,在被旧日儒家尊崇为经典以后,却受到过多的涂饰和曲解。如汉人以“政教”观点说诗,篇

篇附会为美、刺；宋人以“理欲心性”说诗，又篇篇牵合伦理纲常；有的学者更以“微言大义”说诗，以企达到“经世致用”的目的等等。总之，就其论析每篇诗的主旨来看，往往切合诗之原意者少，借题发挥者多。本来诗之特点是语句简炼，多用比兴，又偏于主观抒情。又加以时代久远，资料有阙，要正确无误地解释每篇诗的主旨、作意，注解清楚诗中的每章每句，实属不易。

杨任之先生家学有自，学养深厚，治诗多年，独有心得。前曾撰有《诗经今译今注》一书，出版后颇受学术界所关注。今更不顾年迈，勤奋治学，成此《诗经探源》一书，广集资料，或折衷旧说，或独申己见。既对《诗经》一书做正本清源的研究，又深入浅出极有可读性，我拜读后深受教益。今此书行将付梓，嘱余为序，余与杨任老有多年同事之谊，又曾有卜邻之雅，对先生之博学洽闻景仰已久，特别是先生以耄耋之年，犹终日矻矻，治学不止，并取得丰厚成果，实不胜钦佩。这无疑对我等后学也是一个极大的鞭策。兹聊赘数语，以表钦仰之情，并致祝贺之意。是为序。

前言

一、《诗经》是世界文库中的瑰宝

公元前 5 世纪，孔子根据上古所遗诗篇编成《诗经》，原本称《诗》，人们争相传颂，名震当时。公元前 2 世纪汉武帝时，在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大前提下，《诗经》被定为儒家五经之一。从这时开始，《诗经》在经学上，在文学上，取得了崇高的地位，被视为教育人民的手段，安定社会的精神支柱。如此崇高的地位也使研究《诗》学的人，风起云涌，世代相接，不管是那个时代，人才辈出，未尝稍衰。

《诗经》是由三百零五篇所编成，另外还有六篇有目无诗的笙诗。这部诗歌总集，其写作年代，从公元前 11 世纪，或者更早一些，至公元前 6 世纪，前后约六百年。在西方被通常视为世界最古的诗篇的古希腊的《荷马史诗》（由《伊利亚特》与《奥赛罗》两大史诗所合成），其创作年代，有的说在公元前 5 世纪，有的说在公元前 7 世纪，究竟出于何时，至今尚无定论，即使如此，也比《诗经》晚了几百年，而其诗篇的篇目，也不能与《诗经》相提并论。《诗经》是我国最

早的文学宝库之一，它在古往今来的人们心中，是念念不忘、孜孜以学的精神食粮，在中国几千年的诗坛上，它孕育了一朵又一朵的浪花，令人目不暇接，在世界文学史上，也足以傲视古今中外，独树一帜，为举世罕见的瑰宝。

二、孔子编《诗》

今天《诗经》的三百零五篇，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：“古者诗三千余篇，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礼义。上采契、后稷，中述殷、周之盛，至幽、厉之缺，始于衽席，故曰‘《关雎》之乱以为《风》始，《鹿鸣》为《小雅》始，《文王》为《大雅》始，《清庙》为《颂》始。’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《武》《雅》《颂》之音。礼乐自此可得而述，以备王道，成六艺。”孔子自己也说：“吾自卫返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”（见《论语·子罕》，这是鲁哀公十一年事，即公元前484年。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：“孔子正乐，兼有风、雅、颂，此不及风者，举雅、颂、则风可知。”）孔子还说过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。’”此指其所编的《诗》三百篇（见《论语·为政》）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，提到《诗》的有十八处之多，可见孔子对其编《诗》的旨趣，及其重视之深厚。又晚于孔子约一百年的墨子，也向儒者孟公说：“诵诗三百，弦诗三百，歌诗三百，舞诗三百。”这里指儒者所编的《诗》而言，这儒者所指，就是孔子了。

孔子编成《诗经》，两千多年以来，历代学者毫无异议，并以尊敬的目光对待《诗经》，阅读和研究《诗经》，这也是《诗经》经过千锤百炼之后，巍然不动，光芒永放的原因。但是，也有无知者，否认《诗经》的存在，认为它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，又不能指出编《诗》者究为何人。因此，我们应该不厌其烦地从各个方面提出孔子编《诗》的确凿论证，以尊重中国的固有文化。它不是空穴来风。

从三千多篇中，由孔子筛选三百零五篇，编成《诗经》，井然有序，条理分明。但也不能说，孔子就能囊括天下所有的诗篇，那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。其中有未被孔子看见，或未被孔子选入的诗篇，

也有流传于世、脍炙人口的，世称“逸诗”，这些诗，也不失为古代诗中的美丽花朵，如《茅鸱》、《唐棣之花》等等。清人桂馥论“逸诗”说：“古者谣谚皆谓之诗，其采入道入者，如《国风》是也。未集者，传于里巷。凡周、秦诸书，引诗不在四家（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韩》、《毛》）编内者，皆得以传闻，故曰‘逸诗’（即游逸于《诗经》之外的诗）。”但有人说，这些“逸诗”是被孔子删掉的，这是故入人罪，不足为信。当时的社会闭塞，交通不便，孔子怎么能概见全国的诗篇，一一选编入册。的确，在秦、汉以前的典籍中，不乏“逸诗”。例如，上古最早的诗篇：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帝力何有于我哉！”（见《乐府诗集·杂曲歌谣一·击壤歌》）如《国语·周语》：“兽恶其网，民恶其上。”《左传·桓公十年》：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”又如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：“有孺子歌曰：‘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。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’”《荀子·王霸》：“诗云：‘如霜雪之将将，如日月之光明。为之则存，不为则亡。’”还有清人郝懿行所辑的数十首《诗经拾遗》，也应该视为“逸诗”之类。所有这些，在于说明《诗经》所编之诗，与“逸诗”之诗，一为孔子所编，一为孔子漏编而已。

为什么强调孔子编诗的同时，要突出说明“逸诗”。这可以旁证《诗经》，其所以成为《经》，是经过孔子手编的，两者泾渭分明，不容混淆。但后来有的学者，把中国的古书，说成都是伪书，言外之意，也包括《诗经》在内。也有人企图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，说成一张白纸，说《五经》与孔子无关，《诗经》也不是孔子所编。这不过是一时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终究黑云无法掩蔽阳光的光芒四射。当然，数典忘祖者有之，哗众取宠者有之，怀有偏见者有之，则形形色色的奇谈怪论，就信口而出了。

三、《诗经》的兴起

战国末，秦始皇统一了中国，为了实现长期统治中国的梦想，采取了焚书坑儒，以愚人民的政策。儒家经典，除了《易经》，因其为

卜筮之书,未被焚烧外,其他经书付之一炬。至于《诗经》,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:“故古有采诗之官,王者所以观风俗,知得失,自考正也。孔子纯取周诗,上采殷,下取鲁,凡三百五篇,遭秦(火)而全者,以其讽诵,不独在竹帛故也。”这样,《诗经》保存了下来,而完好无缺了。

暴秦灭亡,汉政权建立,汉高祖既得政权,陆(贾)生时时前说《诗》、《书》。高帝骂之曰:“迺(乃)棕公居马上而得之,安事《诗》、《书》!”陆生曰:“居马上得之,宁可以马上治之乎?且汤、武逆取而以顺守之,文武并用,长久之术也。昔者吴王夫差、智伯极武而亡。秦任刑法不变,卒灭嬴氏(秦)。向使秦已并天下,行仁义,法先圣,陛下安得而有之?”(见《史记·酈生陆贾传》)。于是汉高祖感悟,乃偃武修文。后世帝王遵守高祖之策,搜求诗书。因此,《诗》的发展,逐渐勃兴,以此为契机,节节前进,秦末汉初,其所流传的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韩》、《毛》四家诗而言,其《诗》的原文和章节几乎完全一致,其所不同的,只是《诗序》和《传》,即《注》,有些个别地方不同。其“字”因汉字的通假广泛,在形、音、义之外,直至隔韵的字也有通假。这就是个别字句不同的原因。

《诗经》是如何流传至今的呢?当时孔子好诗,以《诗》教授弟子。凡属士人,几乎人人学《诗》,所以,如长江大河之水,流传不息,一直流传至今。就《诗》学而言,仅就一方面看,由孔子的学生子夏传曾申,申传魏人李克,克传鲁人孟仲子,孟仲子传牟根子,牟根子传赵人荀卿(公元前313?—238年),荀子传鲁人大毛公,即毛亨,大毛公传小毛公,即毛萇,世称《毛诗》。《鲁诗》也为荀子所传,荀子传《诗》于浮丘白,浮丘白传鲁人申培公。韩婴之《韩》诗,也是荀子所传,还有辕固生的《齐诗》,据说也是荀子所传,而荀子所传之《诗》,也只是众流中的一支,其所传《诗》者,还不知凡几。当秦末汉初,儒家传授经学,因书写困难,都由口授,几传之后,句读义训互有歧义,乃分为各家,师所传授,弟子一字不能改易,界限甚严,这

就叫传“家法”，由此我们可以了解，《诗》有四家的来龙去脉了。

四、《毛诗》独领风骚

汉初，《诗》学大兴，有今文《诗》学的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韩》三家，以及古文《诗》学的《毛诗》。何谓“今文”与“古文”？秦始皇焚书坑儒后，经学一时中绝。汉兴，诸儒渐以经学教授弟子，其写本皆用秦汉时通行的隶书，遂称今文经学。其后，古文经学出，其书，用古籀文书写的，谓为古文经学（后也改用通行的隶书书写。）在《诗》学上，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韩》三家，用今文传写的，故谓之“今文”《诗经》。

汉武帝时，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，其时，五经之学风起云涌，席卷全国。自是之后，《诗》学应运而生，言《诗》于鲁，则为申培公，于齐则轅固生，于燕则韩太尉（婴）。其中，轅固生于景帝时为博士，韩婴为文帝时博士，其孙商武帝时为博士。申公曾传楚太子戊，申公的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，大儒韦贤与其子玄成，皆习《鲁》诗，故齐、鲁、韩三家皆显贵。当时学者皆师事三家，即使至汉末的蔡邕与曹操皆习三家诗。参见《史记·儒林传》、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，等等。

后来，由孔壁中发现的，或出土的，由古籀书写的经书，称为古文经书，其中包括《毛诗》、《春秋左传》、《古文尚书》等，《毛诗》被列入“古文经书”的范畴，从此遂由书体之名，变为学派之名。

西汉末，中垒校尉刘歆，请将《毛诗》、《春秋左传》、《周礼》以及《古文尚书》等列入学官，被今文学派反对，几经辩论，未果。西汉时，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竞争激烈，因为今文学派先出，占风气之先，而今文学派的发展，渐渐脱离了学术的轨道，以谶纬之学迎合帝王的思想，并大肆宣扬宗教迷信，不再以儒家经义释经。而古文学派，其作风相反，实事求是，而以朴实之学说经，引经据典，以考据经文，不为时君世主所欢迎，这是刘歆所请失败的症结。后来王莽当政，《毛诗》列入学官。王莽失败，到了汉光武时，因刘秀酷信谶纬之学，将被列入学官的《毛诗》也罢止了。所以，今文学派的《诗经》，如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韩》三家，一直居于显学的地位。

东汉时,名儒郑众、贾逵、马融等治《毛诗》,《毛诗》之学大兴,及至通今古文学的大师郑玄为《毛诗》作《笺》,加强了《毛诗》的地位,疏通了《毛诗》的义理,而《笺》旨,也是根据经典、史实、文字的理解以说《诗》,使人读之感到更加舒畅,所谓“疏不破注”。但,也有个别地方,《诗序》与《笺》有所抵触,如《小雅》中的《十月之交》、《雨无正》、《小宛》等篇,《序》谓刺幽王,而《笺》说刺厉王,据后人考证,仍以刺幽王为允。《毛诗》大盛,而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韩》三家渐衰。《齐诗》于魏时已亡,《鲁诗》亡于西晋,《韩诗》至宋末时已湮没无闻了。

到了清朝,陈乔枏作《齐鲁韩三家诗遗说考》,魏源作《诗古微》,及至清末的王先谦作《诗三家义集疏》,集三家诗遗说之大成。但是,王先谦的《诗三家义集疏》,虽有《序》及传注,而仍以《毛诗序》及《传》、《笺》为主。因三家所遗之《序》不多,其与《毛诗序》有出入者,除《周颂》外,其他屈指可数,即使是《周颂》之《诗序》,基本上与《毛诗序》雷同,其不同的地方,只是字句的不同,诗旨基本一致。当然,为了搞清三家与《毛诗》的关系,以及古诗遗说,以及对古代文化的保存等,这种集录,仍具有一定的价值。

今天看来三家诗与《毛诗》相较,有其根本不同之点,三家诗虽渊源于荀子,但均是几传之后,才成其各自的《诗》说,而《毛诗》有其独到之处。因大毛公生当六国,又在暴秦焚书之先,其受业于荀子,治学严谨,取之有据。所谓与子夏合写的《诗序》,恐怕是口耳相传。事实上,子夏与毛亨相距两三百余年,何以合写?事难置信。自古以来,其说如此,仅备一说。其《序》、《传》,经后人研究,脉络井然,没有穿凿牵强之说,它多取义于荀子,与《荀子》一书对照,师徒配合默契,如天衣之无缝。其《诗序》取义于《春秋左传》的有《桑中》、《鹑之奔奔》、《载驱》、《硕人》、《黄鸟》、《四牡》、《常棣》、《湛露》、《彤弓》、《行苇》、《沔酌》,等等,皆与《左传》吻合,而《国语》也是如此。《国语》出自左丘明之手,谓为《春秋外传》,其中的《葛覃》、《天作》、《旱麓》、《皇皇者华》、《新台》、《既醉》、《昊天有成命》,等

等，亦为毛公所取，这些都比三家诗，精确旨深；而毛亨说《诗》，也有取自孟子的，当然亦不尽然，细较《毛传》字的释义，也多取自《尔雅》，当然亦不尽然，细较《毛传》与《尔雅》，有的字异义同，有的与《尔雅》训异义同，有的不用《尔雅》为说，这一切对后代影响都很大。其后大儒如贾逵、郑众、郑玄，以及撰写《说文解字》的许慎，皆以《毛诗》为宗，以致后世学者都以《毛诗》为说《诗》的根据。

唐时，孔颖达作《毛诗注疏》，即《毛诗正义》，《孔疏》以引申《毛》义为旨。如《毛诗》同一字，《毛传》不易字，郑《笺》始有易字之义，往往《传》所不易之字，而《笺》易之。这不是标新立异，是依文立解，不是这样，其说难通。至唐初，陆德明《释文》以及孔颖达《正义》，他们所遵行之本不能统一，似乎各行其是。后来，《毛诗》日益盛行，其于《经》，于《传》、《笺》，于《疏》或有意而为，或无意伪脱。如细心详研，则《经》有《经》之例，《传》有《传》之例，《笺》有《笺》之例，《疏》有《疏》之例。如折衷于《孟子》的“不以辞害意”，而阅读《毛诗》，则可融会贯通、或可豁然开朗。（详见清代阮元《毛诗注疏校勘记序》）。从此形成全国上下以《毛诗》为宗，作为不可逾越的经典。

到了北宋时，欧阳修在其《诗本义》中对《诗序》提出若干疑义，继而有苏辙的《诗传》，郑樵的《诗传辨妄》，及至南宋的朱熹，在其《诗序辩说》中，对《诗序》批评甚多，从此形成了《诗》学的义理之学。有的批评实事求是，无可非议，也有牵强附会之说，这就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，见解各异。

《诗》的宋学，虽然以义理说《诗》，在另一方面，它加强了人们对《诗》的理解，更深入一步。例如，汉学把“情诗”说成是思贤若渴，宋学揭开了这个“面纱”，说这是“情诗”，使人们恍然大悟；把以美为刺的诗，也更加明朗地指明；把一些失于史实的诗说纠正过来，这些无疑有益于《诗》学。事实上宋学对《诗》的评议，基本上还是根据《毛诗序》、《传》、《笺》为说，不是漫无边际，只是对个别篇章，提出不同的意见，而对《诗》的本身，还是赞扬不已。这等于说，汉学与

宋学,好像是一物的两面,或者说,宋学是对汉学的补充。

到了清代,朴学大兴。他们以考据、训诂之学说《诗》,一改宋的义理之学的方向,复归于汉学,其中戴震、段玉裁、王念孙父子、焦循、魏源、陈启源等等,均为其中的佼佼者,其他如陈奂的《诗毛氏传疏》,以及马瑞辰的《毛诗传笺通释》,以汉学说《诗》,已经到了极高的学术水平。即使是王先谦的《诗三家义集疏》,也是以《诗序》、《传》、《笺》为主,使《毛诗》之学,更加辉煌,使《毛诗》深深地扎入人心。

当然,《毛诗》的崇高地位,不容怀疑,但是,其不足之处也无庸讳言,这是由时代所局限,自然而然地产生的,我们只能以时代的眼光去分析,不能用超时代的观点去指手划脚。《毛诗》在古典经学中,具有独特的地位。清人阮元所编辑的《十三经注疏》,把篇幅有数百万字之巨的《毛诗正义》选入其中,这就证明了《毛诗》的伟大,深入人心。所以,《毛诗》对中国诗词的贡献,其功绩斑斑可见,不可磨灭。在中国两千多年的诗的长河中,《毛诗》独领风骚,巍然屹立在世界的诗坛上。

五、《诗》的发展及其影响

春秋战国以前,这部三百零五篇的《诗经》,把当时的社会、政治、人情等各方面写得淋漓至尽。它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几千年前的历史面貌,表达出了中国人的思想感情,渊源有自,这是一部有血有肉可歌可泣的记载。如果粗略地分析,其诗作有史诗、情诗、社会诗、刺诗、怨诗等等,其诗情委婉、隐晦、缠绵、奔放、豪情满怀,读之无不沁人心脾,发人深省。在《诗经》中,情诗占压倒多数。据后人估计,仅《国风》一百六十篇中,情诗有八十多篇,在《雅》中也有情诗。如《郑风》中的《溱洧》,写男女豪情奔放,如飞如驰,跃然纸上;又如《东门之墀》,谓其所想念的人,就在眼前的屋中,由于种种观念的束缚,其人似远隔天边,那种思念之情,好像无所措手足,忐忑不安,无时可止;又如《王风·大车》,写男女相约誓同生死的诗,

因怕大夫的干预,不敢亲近等等。其中的史诗,如《秦风》中的《黄鸟》,写以人殉葬的残酷情景,令人不忍卒读。又如在《豳风》中周公所写的《鸛鸣》,恰好与《尚书·周书·金縢》相对应。以及写公元前776年的灾异之变的《十月之交》亦与史籍的记载相吻合。还有一些刺诗,如齐襄公淫于其妹文姜的诗,即《南山》、《敝笱》、《载驱》、《猗嗟》;如《邶风》中的《墙有茨》和《君子偕老》,都是刺卫宣公之妾宣姜淫乱无耻之诗。《诗经》对剥削者进行了无情鞭鞑,如《魏风》中的《伐檀》与《硕鼠》两诗。《诗》的艺术表现方法也十分高超,以《宾之初筵》为例,据近人陈子展说:“(其诗)傲戒丁宁,结局严肃,我(陈自指)以为扬雄《酒箴》,刘伶《酒德颂》,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,都不失为名篇……无论其思想性或艺术性,仍当推之《宾之初筵》一篇为首出的杰作。”所有这些,不一而足。总之,一部《诗经》篇篇都有所指,针针见血,不是无的放矢之作。

西周至春秋时的诗篇,其光芒照耀了后人。因此,后人在这个奇花灿烂的沃土上,又连续不断地孕育了新的诗的天地,其接踵而至的,有以屈原为滥觞的楚辞,其弟子宋玉、景差等,对楚辞都有卓越的贡献,其中还包括汉代的淮南小山、东方朔、王褒、刘向等人。如屈原的《离骚》,反复倾诉对楚国的怀念,以美人香草自比高洁,最后以身殉志,令人景仰,又如宋玉的《风赋》、《对楚王问》,文字活泼生动,令人似乎身在境遇之中。这脱胎于《诗经》的《溱洧》、《庭燎》、《蒹葭》等诗,但又不着痕迹,在《诗》的艺术沃土滋养下,在诗的意境创造手法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。

与《楚辞》并驾齐驱的,就是汉赋了。汉赋始于战国末期的荀子。荀子精通《诗》,曾以《诗》教授多人。《诗》中的赋,是《诗》的创作方式之一。在《荀子》文集中,有《赋》篇,其形式也如《诗》四字为句的章法。在《赋》篇中,假物寓意,借云、蚕、针等的形象的辅陈采,颂扬和表达自己的思想,显现对《诗》的赋的手法有所因循。赋在汉代发展起来了,与荀子的影响不无关系。汉赋发展到了司马相如,

如奇峰突起，令人向往。司马相如以《子虚赋》为武帝所赏识，因赋得幸。其后又有《上林》、《大人》等赋，名震当时。司马迁说：“相如虽多虚辞滥说，然其要归引之节俭，此与《诗》之风谏何异。”（见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》）相继而起的，有扬雄、班固、张衡等人。虽词藻华丽，它以讽刺见长，真所谓主文而谏了。

诗歌向前发展，就是汉魏《乐府》了。本来就如道人采诗一样，即当时的乐府官署所采制的诗歌，以及唐、五代可以入乐的诗歌，和仿《乐府》古题的作品，都称“乐府”。后来宋人郭茂倩所编的《乐府诗集》一百卷，辑录汉、魏、至唐、五代的歌词，还有先秦歌谣分十二类，每一类都有序言，备述成诗梗概，每曲都有题解，溯源考订，比较详尽。

沿着《诗》的足迹，到了唐代，更是波澜壮阔了。盛唐时的大诗人李白和杜甫，是中国诗史的高峰。李白，初隐居四川岷山，贺知章读了他的诗文，叹为谪仙。杜甫，字子美，襄阳人，他们两人的诗作，格律高雅，有神出鬼没之奇，为后世学者的楷模。其后有白居易、元稹、李商隐等人。一个个异峰突起，神笔相连。用白居易的话说，如珠玉落盘，铮铮有声。清以后若干人，编辑了好几个版本的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就是仿效《诗经》三百篇而命名。同时也寓意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就是《诗经》三百首的延续，直接继承了《诗经》来自民间的精神，如造词、遣句、用韵等方面，都是脉络有致，用语生动、形象，它已成为中国诗学史上，接续了《诗经》，又发展了《诗经》的后世文人运用诗作的典范。诸如用韵方式，有的句句用韵，有的隔句用韵。特别是一、二、四用韵的格式，成为唐代律诗的起源。《诗经》中的诗，多以四言为主，但间亦有二言、三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、八言等，随其语气而参差错落。其后宋词、元曲的崛起，更显得诗的活泼起伏。这些创作手法，都是由《诗经》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，为后世词曲开辟了先河。又如近世的新诗，其蓬勃发展，虎虎有生气，其渊源也来自《诗经》。即使今天的《白话诗经》、《白话楚辞》等，虽然形式不

似格律严整的诗,但其所用手法,以及诗意盎然,应该说是《诗经》一脉相承。又如今天的民歌与通俗歌曲,其重章迭句,正是《诗经》中重章迭句的再现。

这里所叙述的《诗经》的发展与影响,只是一个粗略的介绍,中国的诗歌浩如烟海,其源头就是《诗经》。《荀子·子道》:“昔者江出于岷山,其始出也,其源可以滥觞。”这就是说,江河发展之处,其水小,只能浮起酒杯,其顺流而下,始成长江大河。《诗经》就是中国诗歌岷山之头的滥觞了。而《诗》学的发展是迂回曲折的,也是永远向前的。由于它具有崇高的价值,无疑地将永远留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,向前迈进。

近代世界开放了,中国不再闭关自守。中国对外交流日益频繁,也包括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。在世界诗坛上,中国自有其峥嵘的地位。但是,留学海外的人,在诗学上,在一定程度上,受外来诗学的影响,有人把外国的诗歌,在其形成的过程中,以及写诗的方式,直至用语、造句等手法,移植到中国的诗歌中。比如对《诗经》的理解,也以外国所见为说,可以收相互补益之效。但是,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与历史背景,又与中国有别,假如是生硬的移植,可能效果相反,或者是隔靴搔痒,互相异趣,如果中外国情能互通究竟。在中国与外国的诗坛上,有共性,也有个性。能平心静气,实事求是的研究和交流,必能互有补益,则有益于世界诗学,使中国的《诗经》精神实质能流传于国外,必为外人所爱好,中国的《诗经》必将在世界诗坛上更加光芒万丈。

六、《诗经》的分类及其写作手法

据《诗·大序》所说,《诗》有六艺,指“风”、“雅”、“颂”、“赋”、“兴”、“比”。对这六艺的解释,后世众说纷纭。但大体上可以形成一种通用的概念。所谓“风”、“雅”、“颂”,是指《诗》的类别而言;所谓“赋”、“兴”、“比”,是指《诗》的艺术技巧。

现在,分别谈谈《诗》的六义。

“风”，是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，用“风”以引申其义。《诗·大序》说：“‘风’，风也，教也。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。”又说：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，故曰‘风’。”这就大体上说明了‘风’的作用，是由风而起。由于风来自不同的地域，所以有地域的区别，这就是《诗经》中十五《国风》的含义了。朱熹说：“‘国’者，诸侯所封之域。而‘风’者，民俗歌谣之诗也。谓之‘风’者，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，而其言又足以感人，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，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，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，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，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，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。”以上两者就是对“风”的比较权威的说法。实际上简单地说，“风”就是一种地方乐曲的通名。《左传·成公九年》说：“乐操土风。”“土风”即本土的乐调，而“国风”就是各国的乐曲了。

“雅”，《诗》有《小雅》和《大雅》之分。据《毛诗·序》说：“‘雅’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。”而后又从“正”引申为“政”。说“小雅”，即小的政事，“大雅”，即大的政事。《小雅》，一般说来为燕享的乐歌。《大雅》，为会朝的乐歌。但是，在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中，也有悲怨之句，伤时之言，讽咏之意。也有的诗篇，类似《风》，所以，不能以一刀分截其义。于是郑玄又把它分为“正雅”和“变雅”。所谓“变”，就是“不正”的意思。（同样，郑玄也把《风》，分为“正风”与“变风”。）

又有一种说法，“雅”与“夏”古通，夏也是地域，即周人本土。西周王畿和东都洛邑，本称“夏”，周初人也自称“夏”人，而这个地方所唱出的歌，便称“夏”，或叫“夏声”，即夏地之声，即后世所谓“华夏”，其简称为“夏”。因此，直接了当地说，《雅》，即是周王畿的诗。春秋时，有人引《小雅》和《大雅》的诗，都称“周诗”了。（见《国语·晋语》和《楚语》，以及《左传·襄公三十一年》）但是，从两者诗的内容与形式言，不论其风格和内容，两者不能混为一谈，虽说有个别篇章相类，实际上，大相径庭，后人如是言之，今聊备一说。

《颂》，包括《周颂》、《鲁颂》、《商颂》，合称《三颂》。“颂”是歌颂